

疫情、政治与政治学

——六位俄罗斯学者的观点

费海汀^{*} 编译

摘 要：2020 年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对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疫情是对一个国家政治价值、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政治程序和治理绩效的全面考验。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国家的应对结果与政治学的传统认知和判断大相径庭。这就迫使政治学界对许多基本问题进行反思。一些世界主要大国的反省与思考尤其值得我们借鉴。为此，编者特地约请了六位俄罗斯学者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就疫情与政治、疫情与政治学两个主题进行评论。六位学者中既有来自莫斯科的学者，也有来自圣彼得堡的学者；既有来自科学院系统的学者，也有来自高校系统的学者；既有偏重于理论研究的学者，也有具备实际从政经历的学者；既有关关注国际政治的学者，也有关注国内政治的学者。他们所点评的问题则既包括全球化与民族国家问题、“世界政府”与“区域合作”问题、主权与人权问题、国家与社会问题、社会利益与个人权利问题等“老问题”，也包括政治与科技、政治与生命、政治与社会发展等“新问题”。他们的观点之间存在分歧，侧重点也各有不同。虽然编者对其中的一些观点并不赞同，但依然尝试将其尽量完整、详尽地呈现出来，希望读者能借六位俄罗斯学者的短评管窥当代俄罗斯政治学中的主要视角、重要议题与重点领域。

关键词：新冠疫情；应急管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政治哲学

^{*} 费海汀，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Abstract: The outbreak and prevalence of COVID-19 in 2020 has a great impact on human society. Such epidemic situation is in fact a comprehensive test of political values, political cultures, political system, political process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y of any countries. However, the response results of many countrie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cognition and judg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This new phenomenon forces us to reflect on many basic issues. Experiences and defects of some major countries attract are especially noteworthy. Therefore, six scholars from Russia Federation were invited to comment on two themes as epidemic and politics, epidemic and political science. Six scholars have very different academic backgrounds: they come from Moscow and Saint-Petersberg; from universities and academies of science; some focus on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some have practical political experience; some are specialist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ome pay much attention to domestic politics. They discussed not only the “old issues” such as the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 state, “world government”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weighs of sovereignty and human rights,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social interests and individual rights, but also “new issues” such as problem of polit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blem of politics and human life, politic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re are distinct differences in their views, but just from these differences that we hope to understand the main approaches, topics and areas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in Russia.

Key words: COVID-19, Emergency management, National governance, Global governance, Political philosophy

一、亚库宁^①：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挑战

尽管在 20 世纪上半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动荡，人类社会依然在 20

^①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亚库宁（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Якунин），政治学博士，俄罗斯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公共政策教研室主任。

世纪下半叶成功应对了一些重大的疫情，例如脊髓灰质炎。即使是在“冷战”和两大阵营对立的情况下，各国医护人员也未曾断绝合作。他们在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遗憾的是，当代人类社会和国际组织在团结、灵活、高效治理方面表现出的水平远逊过往。

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正好成了检验国际与国内既有治理体系与治理机构在面临重大挑战时稳定性与可持续性的“试金石”。总体而言，它对三组关系提出了挑战：其一，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过程和机构之间的关系；其二，民族国家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其三，民族国家与其公民，亦即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上述几组关系中，处于关键位置的始终是民族国家及其政府，这并非偶然。

（一）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过程与机构

“冷战”结束之后，人类社会笃信，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将会出现。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丧失了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我们很少反思，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商品、人员、货币和信息的大量流通模糊了国家之间的边界，这似乎是一笔不构成任何威胁的独特财富。但与此同时，一个简单的事实却又被千方百计地掩盖了起来：所谓的“西方世界”作为全球化的鼓吹者，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其主导地位将会亘古不变。试图限制或者调整这一进程的民族国家，即使不被认为是反动的，那至少也被认为是不合理的。但是，正如当前疫情危机所展示的那样，能有效承担起治理职能的全球或区域性机构还并不存在。

国家作用的不断削弱产生了长期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又在疫情期间集中地爆发了出来。各个民族国家的政府都意识到，而且都被迫承担起抗击疫情的全部责任。与此同时，像欧盟一样的区域性机构，和像世界卫生组织一样的全球性机构却并没有展现出应有的效率。相反，它们的声誉还因此蒙受了严重的打击——这首先就体现在对这些组织的信任上面。

这一趋势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关于重新审视“世界秩序”的争论。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当前的世界秩序是什么样的？从政治或者甚至于意识形态的视角来看，当前世界秩序体现为美国霸权的兴衰历程。但是从制度和机构的角度看，“冷战”结束后人类社会并没有在“雅尔塔-波茨坦体系”

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全新的体系，只是以一系列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和 G20 一样的机构对其进行了补充。

今天，对具有调解职能的国际机构的不信任使人类社会面临威胁。这种威胁从前曾经出现过，那时人类社会正被笼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阴云之下。它的具体表现形式正是没有任何有效运转的国际机构。同时，这种不信任的态度也正是由那些声称领导世界的国家（如美国）所宣示的。

遗憾的是，在面对疫情时，我们在压力和焦虑的双重影响下忽视了最重要也最显而易见的东西：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这都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如果说当前的国际政治是由其各个局部分散承担的，那么各个民族国家就必须在新形势下与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建立建设性的关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此时应该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为其他国家树立起榜样。

（二）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

当前，那些在国际贸易时期甚至有能力和主导民族国家政策的跨国公司正面临着新的挑战：首先，行政限制开始出现；其次，全球经济开始下滑。跨国公司的预算往往能够超过许多民族国家。它们能够通过产品的供应链在全球各地活动。但与此同时，跨国公司附加价值的主要部分都是在其“宗主国”（Метрополия）的领土上形成的。实际上，绝大部分的利润与税收也正是来源于此。今天，跨国公司发现自己正处于非常脆弱的境地——它们不得不高度依赖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既能为其提供服务和进出口产品制定规则，又能为其应对危机提供政策支持。

我们观察到，跨国公司的许多业务领域都开始出现了“国有化”（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的新趋势。这一趋势集中体现在金融和税收领域。特别是在类似欧盟一样的大型区域共同体中，离岸管辖逐渐减少，海关监管逐渐加强。

这些跨国公司即将面临的战场是信息化转型。即使是一些已经是世界级巨头的中国和美国的公司，都不得不重新考虑与民族国家展开合作的条件。这种合作首先集中在个人数据的收集、处理和安全方面。其次，这种合作还会包括跨国公司在紧急情况下根据政府的指令做出快速反应。

（三）民族国家及其公民

民族国家与其公民之间的关系同样要经受压力测试。各国政府已经动用紧急权力以阻止疫情的传播。这总是会引起一部分国民的批评。除此之外，当前各国政府还必须做好准备以应对潜在的经济危机。而在这一方面，公民对国家的要求更是会高得多。这一情况很可能使政治斗争白热化，更是有可能为民粹主义政客获得更多的选票创造条件——他们会不负责任地煽风点火，同时对一切选民在危机中希望听到的东西做出承诺。

因此，民族国家正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它必须发展自己的“基础性权力”（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必须通过吸引民众更多地参与国家政策与各种决定的咨询、决策和实施过程，在社会中塑造一些广泛的联盟以支持政府应对危机的措施。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从根本上增加国家治理领域的知识与能力。这也正是我们作为学术界的代表当前必须完成任务。

任何危机都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验。我们看到，民族国家及其机构承担了最主要的压力，而国际机构则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政治家和官员们的任务是尽快消除这种失衡的状态。当前的世界秩序依然是全球性的，是相互依赖的，这样的联系从未消失。当前，无论一个国家像美国一样强大，或者经济像中国一样发达，它也绝不可能在缺乏广泛国际合作与支持的情况下独立确保其公民的健康和福祉。

二、克拉夫琴科^①：新冠肺炎疫情 ——人类如何与微观世界共处^②

当今世界呈现出非线性发展（Нелинейное развитие）的特征。系统性的

①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克拉夫琴科（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равченко），哲学博士，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系主任，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② 本文全文将发表于俄罗斯政治学权威期刊《政治学研究》（Полис）2020年第5期，全名为《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人类健康的挑战——全球范围内人道主义的生命政治学是可能的吗？》（Пандемия COVID-19: Вызовы Здоровью Населения Мира – Возможна ли Гуманистическая Глобальная Биополитика?）。

不确定反复出现。这具体表现为发展速度的起伏、发展方向的分岔以及发展状态的不稳定。这种不确定性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此前这种非线性发展引起的变化还若隐若现，但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这些变化已经日益显著。我们认为，在事关人类健康与自然环境的问题上，如果想要充分反思和认识发展的复杂性与非线性特征，至少有三个特征尤其值得注意。

（1）正如约翰·厄里^①指出的那样，反思和理解非线性发展的理论基础即是“蝴蝶效应”（Эффект Бабочки）：即使在一个社会领域里发生的相对微小的变化，也可能带来其他领域社会发展的一连串分岔和根本性转变。在这种变化规律的作用下，即使在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中发生的事件，也可能对整个人类社会造成影响，同时引发在其他诸如经济、贸易、就业、教育等领域的非线性发展变化。这些事件甚至也可能对自然界产生祸福难料的影响。在新冠肺炎的案例中，就是最初极少数感染的患者最终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巨变。

（2）早在21世纪初，阶级分化造成的社会撕裂就已经开始令一部分人失去自己在世界上的立锥之地。^②他们汇聚起来成为社会的边缘人群。新冠肺炎疫情使他们的规模扩大了数倍。有时他们之中甚至出现了一些奇特的变种。例如在大型游艇上享受“高端休闲”项目却被迫进行隔离和自我隔离的人们，以及因为各国边境关闭而不得不四处漂泊寻找港口的渔民们。相应的，贸易遭受重创，各个经济主体的收入也都出现波动。只有那些能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与生活以符合国家利益，转入食品、卫生、医药、健康行业的人们才是唯一的获益者。

（3）当前的技术创新，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以高度组织化的形式处理科学知识。它的导向则是注重实效和不断增殖财富。但这同时也造成了它与社会体系及其所在的生态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如果对其进行反思，人们不难发现，人类不仅改造了细菌和病毒，同时也正被它们所改造着。“与流行病共生的社会”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类型。人们需要从总体上反思自己与流行病之间的关系——毕竟艾滋病、麻疹、肝炎和其他一些传染病并未消失。人们需要积极地适应与微生物共存的生存方式。实际上，微生物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来说并不危险，甚至应该被看作是有益的。当然，在此过程中也会存

① Urry, J., *Climate Change and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p. 28, 41-42.

② Bauman, Z., *Liquid Times: Living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9, p. 45.

在一些潜在的威胁。例如像阿甘本所指出的，“牲人”^①（homo sacer）的出现。如果我们的生命政治学（biopolitics）^②任由医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受到政治操弄，那么人类就会成为毫无权利的存在^③。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出现，我们认为，必须制定与微生物和生态系统共生的战略计划。

新冠肺炎疫情比以往“传统”的流行病更加复杂。它带来了一些新的风险。这些风险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首先，它们是全球性的，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空间内。其次，它们还存在人与动物相互反复影响的趋势。现代流行病学研究还表明，病毒会产生变异。它们会出现某种形式的变体，在将来可能形成完全不同的形态，甚至转变为全新的毒株。这意味着，病毒已经永久性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人类必须不断寻找方法以尽量降低与病毒接触的风险。事实上，新冠肺炎的风险具有某种变动性的特征，这也正是其复杂性的表现。因此，新冠肺炎的疫情则正可以促使人类社会创造一种全新的理论与方法工具，用以研究全球性的和超微观的复杂问题。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造成人类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撕裂的力量正在增强。仅仅停留在宣言中的欧洲价值观并没有发挥实际作用。国际合作陷入停顿，对抗疫情只能依靠各个国家各自动员。而这些动员实际上也仅仅是建立在利己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的基础之上。最初欧盟就低估了疫情的风险，既没有开展卫生防疫宣传教育，也没有在欧盟的层次上对医疗资源进行整合。例如在意大利，新冠肺炎的风险比在其他任何欧盟国家都高。当时意大利还期待着欧盟方面的援助。但是欧盟陷入了瘫痪，它没有做出任何决策以提供意大利必需的医疗和经济援助。这些援助反而是由俄罗斯、中国和古巴所提供的。

所有这些现象都在要求着人类社会利用科技创新的成就，采取新的措施来保护自然环境，也造福人类自身。例如，在俄罗斯，在中国，在其他很多国家，政府都在挖掘数字化的潜力，特别是在诊断感染风险方面。银行卡与手机 SIM 卡可以判断它们的持有者是否曾到访疫情传播的风险地区，还能显

① 牲人，意大利哲学家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提出的概念，意指“被献祭的个体”，被政治共同体所排除的对象，失去权利的个人。

② 生命政治学，主要探讨个体生命与其周围政治与社会语境之间关系，典型学者如福柯、阿甘本等。

③ Agamben, G.,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示他们与病毒携带者的接触情况。这些数据被收集起来，然后出于人道主义提供给专业的卫生防疫人员和负责家庭隔离检疫的监管机构，以便他们阻止疫情蔓延。的确，这对个人权利构成了挑战。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具体的历史和文化语境决定着个人权利的阐述方式。我们认为，在新型疫情流行的环境中，应该从强调社会利益的优先性，以及如何调整人类与微生物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入手重新审视个人权利的内涵。我们认为，对所有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成就进行整合正是在这条道路上应该迈出的第一步。

三、库兹涅佐夫^①：俄罗斯与新冠肺炎疫情——推动信息技术发展的良机？

至2020年8月中旬，在俄罗斯发现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超过90万例。只有美国、巴西、印度等人口明显超过俄罗斯的国家，确诊病患的数字才会更大。根据官方统计，过去半年内在俄罗斯就有超过1.5万人逝于感染。其中，仅仅在莫斯科就有4600人。首都的统计数据表明，如果考虑到因感染新冠肺炎合并其他基础疾病（如肿瘤）加速死亡进程的患者，这一数字至少还要增加一倍。因此，仅就死亡人数而言，俄罗斯还要超过前面的墨西哥、英国和意大利，居于世界第7位，而不是第11位。

如同其他国家一样，俄罗斯的经济也因疫情遭到重创。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的数据，与2019年同期相比，2020年上半年俄罗斯的工业总产值下降3.5%，零售贸易额下降6.4%，营利性服务业收入下降19.9%。2020年失业率为2019年的112.6%，达到460万人。然而，在这种背景下，也可以观察到一些积极的信号，特别是俄罗斯对信息技术的利用显著增加。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环境下，政府服务已经成为信息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在建设各种公民与政府部门间的互动桥梁，但是只有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紧急情况下，才有机会测试这些昂贵的系统在高负荷运转时的表现。例如，莫斯科的居民就曾短暂地遇到过一个问题：通过政府提供服务的官方入口办理进出首都的数字通行证时遭遇困难。首先，65岁以上的申请

^① 阿列克谢·弗拉基米洛维奇·库兹涅佐夫（Алекс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Кузнецов），经济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代理所长、首席研究员。

人很难顺利获得医院的数字化检疫服务。另外，根据媒体的报道，数据库遭遇黑客攻击的频率也出现增加。然而总的来说，俄罗斯的联邦和地方政府建立的数字化系统还是成功地运转了起来，这些暴露出来的缺陷也迅速得到了纠正。

在 2020 年的检疫压力下，国家被迫强制使用数字技术。这一政策使得俄罗斯的公民开始更加频繁地使用互联网来与商业实体进行交易，特别是与那些国有的实体。例如，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Сбербанк）的网上银行一直在发展。而国家则正是通过在俄罗斯银行业中占主导地位的储蓄银行实现了对公务人员奖金、退休金和工资的支付。通过储蓄银行的网上银行可以支付公用事业和其他很多服务的费用。结果，2020 年第二季度，储蓄银行网上银行的日活跃用户量上涨了 10%，达到了 2720 万人，而月活跃用户量上涨了 5%，达到 6000 万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城市里出租、送餐和货物快递服务，以及非食品类商品网上订货的整合与发展。例如，2020 年第二季度 Yandex 公司的总营业额与 2019 年同期持平，但其中 Yandex 的出租车服务营业额增加了 42%。国家对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的限制，以及强制性的“口罩令”推动了这类民营企业迅猛发展。同样，暂停餐饮行业运营，以及长期警示商店拥挤空间存在危险等措施同样造成了这样的效果。

也许，俄罗斯的学者同西方同行一样，略微有些夸大了新冠肺炎疫情中信息化程度加速的情况，毕竟科学教育领域本身就是数字化进程的领头羊。在科学与高等教育界，通过互联网广泛引进远程工作模式和进行业务往来已经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实际上相应的技术早前已经在俄罗斯得到了应用，但仅仅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使用。例如，在疫情之前，只有一些年轻的妈妈愿意进行远程办公，线上课程也只是针对再就业的短期培训项目开设。2020 年的实践表明，网络技术尽管还存在一些缺陷，但在许多情况下都的确是有效的。并且，在控制疫情的过程中，它完全能对科教领域的传统互动模式起到补充作用。

2020 年春，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首次以网络会议的形式举办了在俄罗斯经济学界极负盛名的四月经济与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①，这已经是该会议第 21

① 四月经济与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俄文名称为 Апрельска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по проблемам развития экономики и общества。

次举办了。当然，并非所有在申请人中通过评选产生的与会者都愿意在网上发言，网络会议也存在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但是，由笔者主持的“世界经济”分论坛获得了8年来与传统形式相比最佳的效果。几乎所有的报告都由英文撰写。唯一的缺憾是参会人员失去了在走廊里非正式交流的机会。但是网络会议的优势在于，对主办方而言，邀请著名外国学者作主旨发言的成本降低了许多，并且也有更多不同城市的听众能通过Zoom会议远程接入。另一个令人意外的问题是，一些发言人自愿退会时已经提交了报告，因而担忧自己未完成的研究结果被曝光在一些诸如YouTube的网站上。

视频会议对忙碌的科研工作者来说大大节省了时间。他们不用再奔波于漫长的旅途中，而是只需要切换一下电脑上的窗口。以往很难协调日程的各位专家，现在都能齐聚于一次视频会议之中。例如，笔者在2020年夏季举办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的俄罗斯在线发布会。与2019年相比，发布会邀请到了更多直接投资领域的顶级专家。作为报告执笔人之一，来自日内瓦的卡洛泰教授也作了主旨报告。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作为主办方，甚至都不需在宣传和广告上面花费精力以寻找听众。

之前，曾经担心上了年纪的学者无法掌握新的信息技术。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高校中学者的适应尤为迅速，因为年长的教授们通常都能得到年轻同事和学生的协助。当然，过度理想化线上教育也是不必要的。首先，它只适用于主动学习的学生，并且对于绝大多数研讨和实践类课程是效果不佳的。同时与高校相比，在中小学采用线上教学也更加困难。其次，线上教学还要求对许多课程进行改革，调整学生获取教学资料的途径。这方面教师们暂时还没能适应。凡是在春季采取了隔离措施的俄罗斯地方教育机构，都必须在一周内就转为远程教育，这就使得时间非常紧张。另外，大规模的线上教育也暴露出了许多技术和财务问题。例如，不太富裕的家庭一般不会拥有一台以上的计算机以及稳定的网络连接，更不用说能有几个房间，让两三个孩子互不打扰地进行学习。特别是父母同时也需要远程办公时，这种情况就会更加麻烦。

总而言之，需要指出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在俄罗斯的蔓延令人震惊，同时也凸显了许多的问题。有些问题，特别是许多俄罗斯人不愿遵守严格防疫管控措施的问题很难克服。但是，国家的竞争性优势也得到了彰显。例如，

俄罗斯人很愿意接受信息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和推广。疫情结束之后，还需要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消除阻碍，加速俄罗斯经济的信息化，在俄罗斯建立一个真正的信息社会。

四、叶夫列缅科^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治理

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人类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场由疫情引发的危机不仅使新的威胁成为现实，同样也为人们窥见当代世界运转机制，以及世界各主要大国的真实意图和行动创造了一个“真相时刻”^②。

中国承受了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波也是最沉重的一波打击。目前，美国的领导层努力掀起强大的信息浪潮指责中国，似乎它应该为新型病毒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承担责任。这些指责在任何一个不偏不倚的观察者看来都是完全虚假的，是完全政治化的。现在完全可以肯定，中国已经采取了规模空前的、彻底的措施来抗击疫情。在所有的国家中，中国是第一个在抗击疫情的战役中达到转折点的，这同样也向全世界展示了其政治社会体制进行动员时的潜力、能力与效率。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采取的果断措施，那么全人类都会面临更大的危险。由于这些措施，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得以赢得更充足的时间来进行卫生系统的动员以对抗疫情。

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行政当局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这些行动最初看似是为了降低疫情蔓延的威胁，随后则是表现为一系列刺激措施，以补偿因阻止疫情在美国本土蔓延而造成的损失。美国的卫生系统及其在极端情况下的响应机制已经被证明效率低下。而美国社会的痼疾——严重的社会不公与结构性的种族主义——更是集中地爆发出来。特朗普政府企图通过将疫情责任转嫁给中国的方式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使其不再关注自身政策的巨大失败。美国的政治精英同样利用疫情以加强与中国的对抗，因为中国被认为是美国的主要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当然，除中国之外，

① 德米特里·瓦列里耶维奇·叶夫列缅科（Дмитрий Валерьевич Ефременко），政治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副所长，辽宁大学客座教授。

② 真相时刻（Момент Истины），俄罗斯的一档社会政治类电视节目，专门探讨俄罗斯的深层社会问题。

另一个进行制裁和敌对宣传的目标毫无疑问就是俄罗斯。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使得我们可以就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问题得出一些重要的判断。

（1）中国、俄罗斯及其他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参与者应该加强合作，以捍卫多边原则，特别是像世界卫生组织一样的多边机构。必须保护世界卫生组织不受到美国带有偏见的指责与操控。同时，还必须冷静客观地分析世卫组织在疫情最初爆发阶段的工作中存在的弱点。必须提出旨在提高其作为一个全球性、权威性国际组织效率的工作建议。

（2）中国、俄罗斯与其他真正希望维护自己利益与主权的国家，必须协调努力，以避免一个国家在抗击疫情和卫生防疫安全问题上独断专行。上海合作组织就具有协调这类活动的潜力。在上合组织的框架内，可以建立一系列诸如疫情相互预警、快速反应和紧急情况互助的机制。这些互助和快速反应的中心既可以建立在上合组织成员国中，也可以建立在组织的伙伴国中。在这方面，扩大科学合作也是很重要的。这不仅包括卫生防疫人员和医务工作者的协同，同样也包括各个国家应急管理专家间的合作。

（3）中国、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包括上合组织成员国内的其他国家，都必须确保预防和治疗新冠肺炎的药品、疫苗、医疗设施都能向全球开放。必须避免有关知识产权的垄断，或者西方医药公司通过垄断抬高价格。上合组织成员国本身就具备达到这一目标所必需的科技储备与生产潜力。

（4）解决疫情引发的深层次经济危机，需要各个国家更积极地展开经济合作、紧急扶持和金融贷款。为此可以对既有的机构加以利用——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等。或许可以建立新的机构形式以帮助遭受疫情的国家恢复经济，并使其不必接受随之而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华盛顿共识基础上各种机构强加的政治条件。

（5）新冠肺炎危机实际上也是一个大大加速结构性改革的契机。全球附加价值链的变革无论如何都会发生。这次危机则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领域和可能性，特别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这些国家应该做出合理的选择，更加坚决地降低能源密集型和有害生态环境的产业所占比例，更多地投资发展数字经济。

（6）新冠肺炎在社会层面的一个基本特点在于，它是全球化和数字经济

时代的第一次流行病。数字监控与面部识别技术在阻遏疫情蔓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是中国，许多东亚国家对这些技术的应用都证明了其高效性。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还首先大规模采用了云应用、超级计算机、认知计算、生物和卫生信息的数字映射，以及无人机、智能手机、个人设备的传感器联网等多种技术。这一经验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中许多的技术解决方案也在俄罗斯得到了应用。特别是在有超过 20 万名新冠肺炎感染者的莫斯科。毫无疑问，在发展及应用数字技术以提高卫生防疫安全方面的国际合作正在变得日益紧迫和重要。实际上，在实现“数字丝绸之路”倡议的过程中，完全有可能启动一个特定的方案，使这些技术在更多的国家中得到应用。为此，一个基本原则是应该避免出现制裁和不正当竞争的情况，就像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对类似华为、中兴及其他中国 IT 公司的所作所为。

（7）鉴于新冠肺炎危机对全球经济和世界政治造成的影响，有必要加强俄罗斯、中国和其他第三方国家政治与经济专家的合作，也有必要扩大智库机构、高校与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在必要的情况下，应该设立专门的基金，以资助旨在对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社会、政治与经济影响进行评估的联合研究。

五、孙古罗夫^①：疫情后的政治秩序

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后果，毫无疑问，已经对并且还将会对世界秩序产生重大影响。在各种具有影响力的观点当中，我尤其赞成一种：在世界层面上，需要建立一个新的“会议体系”（Конференция）来制定新的游戏规则。毕竟疫情所造成的损失已经可以与世界大战相提并论了。在这样一个“会议体系”中，需要建立全球合作的机构与工具。这些工具应该能够根据全人类的福祉

①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孙古罗夫（Александр Юрьевич Сунгуров），生物学博士，政治学博士，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圣彼得堡分校应用政治学部教授，曾任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市议会议员（1990—1993）、俄罗斯联邦公众院（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алата 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е РФ）成员（1994—1995）等。

迅速决策并采取措施，而不是以邻为壑。^①

如果从这一观点出发，那么在上一次世界大战基础上建立的“会议体系”就是联合国。在《联合国宪章》中即将尊重人权的价值固定了下来。但是我，作为一个从放射生物学起步的学者，希望能对另一次灾难及其后果进行总结和借鉴。这一灾难就是切尔诺贝利事件。从切尔诺贝利对我国政治生活的影响，以及苏联最后时期外交政策“新思维”的发展角度，相信可以得出一些经验和教训。^②

我指的是，在放射性沉降物已经受风向影响扩散到周边国家时，苏联公民和国际社会掌握的情况却是滞后的。我认为，以切尔诺贝利事件为标志，“大改革”的发展进程和苏联领导层的观念都开始产生变化。他们意识到，政治上需要更加开放和透明。而下一步，则是意识到在世界政治问题上也需要采取“新思维”。在我看来，它的意义至今为止都还没有得到正确的解读。至于在当时，很多人根本就不明白。^③

在“大改革”年代诞生的“新思维”理论认为，在尊重主权独立、遵守互不干涉原则的情况下，各个国家和民族承认对全人类生存的共同责任。“新思维”提出了一个根据全人类普遍价值改造世界的方案。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即是关于全人类和每一个个体都享有生命、自由和安全。^④

当前，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各个国家包括政治精英在内的有识之士有望意识到“新思维”在世界层面的必要性。世界应该借助于这一“新思维”，找到新的、更加高效的全球治理措施。

应该指出的是，提倡“新思维”的重要意义，恰恰在于近几年与之相反的一些倾向正在日益增强。其中典型代表就是主权主义。主权主义，即是指

① Кузнецов Евгений. 2020. Три болезни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которые обострил коронавирус. - Форбс. 14.04. Режим доступа: <https://www.forbes.ru/biznes/398231-tri-bolezni-civilizacii-kotorye-obostril-koronavirus>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08.08.2020) .

② Чернобыльская катастрофа (1986 г.) 1998. - Катастрофы конца XX века М.: УРСС, 1998; Чернобыль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лучшие материалы. Режим доступа: https://www.kp.ru/best/msk/chernobyl_tragedy/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08.08.2020) .

③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всего мира — М.: ИПЛ, 1987.

④ Пандемия как вызов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в XXI веке. Доклад. 2020.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 полит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Горбачев-Фонд») , М. Режим доступа: https://www.gorby.ru/userfiles/file/doclad_gf_16_06_20.pdf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08.08.2020) .

在全球范围内强化国家主权的倾向。无论是美国的特朗普主义，还是英国脱欧，以及俄罗斯的类似现象皆属此类。这种全球范围内的倾向只有在疫情这类事件中才会得到改变。

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实际上是在发扬一些文化与科学活动家所倡导的传统，比如尼古拉·洛里奇（Николай Рерих）^①、弗拉基米尔·维尔纳茨基（Владимир Вернадский）^② 等等。他们认识到全球化趋势的必然性，因此也认为，需要世界各国的精英携手努力才能避免其负面影响。影响“新思维”的另一个思想根源是罗马俱乐部的报告。这些报告自 1968 年起定期出版，促进了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形成。^③

我们需要首先将联合国视作人类社会建立的唯一的全球性组织。联合国的重要之处在于，它的建立意味着对个人权利普遍性的承认，意味着这一原则比各个国家的主权更加重要。事实上，正是由于“神圣的”主权原则才让纳粹德国能“合法地”毁灭数百万公民，并随之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场战争的恐怖令全世界为之震惊。也正是因此，联合国的各个创始成员国才承认了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自那时起，已经过去了 70 多年。过去的战争开始被遗忘，在许多国家也再次开始强调国家主权的优先地位。回到联合国的问题上，我们可以回想，在其建立之初就曾出现过一些意见和方案，建议将其转化为一个更加强有力的组织。例如，通过世界人民直接投票选举联合国大会。这将使联合国安理会同样将会根据某一特定原则由联合国大会选出。^④

这项建议当时没有被采纳。很有可能，它有些过于超前于自己的时代

①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洛里奇（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Рерих）（1874—1947），俄罗斯画家、作家、哲学家。倡导保护艺术与科学，曾发起旨在保护文化遗产的《洛里奇公约》（Roerich Pact），数度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详见介绍见 Капустин А, Баренбойм Б, Захаров А., Кравченко Д. Пакт Рериха как основа новой Конвенции ООН о защите культурных ценностей. — М.: ЛУМ, 2014.

②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维尔纳茨基（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Вернадский）（1863—1945），俄罗斯地理与地质学家，曾提出“人类圈”（Noosphere）和“生物地球化学”（Biogeochemistry）概念，认为人类生命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生物圈和地质圈。详见介绍见 Вернадский В.И. Биосфера и ноосфера. Москва : Айрис Пресс : Рольф, 2002. С. 573.

③ Печчеи Аурелио. 2020. Архитекторы мира. Записки Римского клуба.- М.: Родина.

④ Кларк Г. и Сон Л. Б., Достижение всеобщего мира через мировое право. Два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ых плана. / Тео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Хрестоматия - М, 2003, С. 115-131.

了。其结果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还是 20 世纪的遗存，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拥有一票否决权。这就导致安理会在许多领域的效力都遭到削弱。因此，要加强联合国作为全球治理机构的作用，最紧要的措施之一就是要改革安理会。同时，我认为，也应该重拾 60 年前克拉克先生（Grenville Clark）和索恩（Louis B. Sohn）先生^①的提议，考虑联合国大会的直接选举。

如果不向着这一方向努力，那么在全球范围内就不可避免地将会建立许多政治中心。一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就会试图行使“保护权”，就像在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情况一样。这条道路是漫长且艰难的，但必须向着这一方向努力。俄罗斯和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也应该进行行动议做出表率。值得一提的是，萨哈罗夫院士在 1975 年就曾提议在联合国之下设立一个关于法律、社会、生态环境与裁军问题的国际专家咨询委员会。^②这一委员会有权要求所有国家的政府对质询和建议做出明确答复。这样一个委员会至今也没有建立，也许在这一方面也需要携手努力。

当然，联合国的专家建议毫无疑问是有用的。但问题在于，各领域专家的候选人实际上都由相应国家的政府推荐。因此，一些国家的政府很有可能只提名忠于政府的专家。因此需要建立其他渠道，将独立专家纳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工作当中。

综上所述，提倡“新思维”的观念、人类文明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存在一个全人类普遍价值观的观念，对世界各国共同处置“后疫情时代”包括联合国改革、改变主权主义发展趋势等复杂问题来说都将会是卓有成效的。

① 格伦维尔·克拉克，美国律师，哈佛公司（Harvard Corporation）成员，曾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路易斯·索恩，美国国际法学者，曾参与联合国与国际法庭的创建，曾任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曾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克拉克与索恩二人曾合著《通过世界法实现世界和平》（*World Peace Through World Law*）。

② Сахаров А.Д. О стране и мире //Тревога и надежда. – 2-е изд. –М.: «Интер-Версо», 1991.

六、维利索夫^①：我们能从危机中获益吗？

（一）危机已经降临了吗？

2020年3月，当欧洲国家开始进行检疫以防止新冠肺炎传播时，俄罗斯似乎还是疫情中的避风港。俄罗斯的游客们也没有放弃在3月初妇女节期间前往意大利度假的计划。对俄罗斯来说，情况在4月急剧恶化。此时，俄罗斯正遭受着双重打击。在俄罗斯退出“欧佩克+”协议之后，原油价格跌破历史记录，其期货交易价格甚至跌为负数。暴跌的原因起初是人为的，主要与沙特阿拉伯对俄罗斯的“价格战”有关。

但是，后来石油市场开始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由于疫情的原因，能源的贸易额和产量都出现缩减，因而需求也出现急剧下降。当前，专家们正在争论，价格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危机前的水平。但是，对于许多石油出口国来说，多重危机意味着最艰难的时刻已经到来。例如，中东国家都不得不重估本年度预算，并预计将会大幅缩减公共开支。像阿尔及利亚政府就已经宣布，2020年的公共开支将会大幅缩减。问题在于，如果想要平衡公共开支的预算，那么石油价格就必须远远高于现在的水平。在伊拉克和科威特，需要达到60美元/桶，而在阿尔及利亚则需要超过100美元/桶。^②俄罗斯同样也经历了这样的问题。好在俄罗斯的预算一开始就是根据相对较低的石油预测价格制定的。

一部分人为之震惊，另一部分人则开始谈论对未来的预测。在这些关于低碳或无碳能源世界以及“绿色经济”的图景中，俄罗斯通常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绿色世界”的支持者和辩护者中常见的一个逻辑是这样的：俄罗斯就是一个“石油国家”，它利用化石能源的收入来支撑自己的地缘政治野心。同时，“资源诅咒”的规律严重影响着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一方面，俄罗斯的经济形式越来越单一并缺乏竞争力，因而在危机面前就更加脆弱；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民主化程度越来越低，因此也相应地越来越缺乏韧性和

① 马克西姆·弗拉基米洛维奇·维利索夫（Максим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Вилисов），政治学副博士，俄罗斯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公共政策教研室副主任。

② 见《经济学人》的评估数据：The Economist (<https://www.economist.com/middle-east-and-africa/2020/07/18/the-end-of-the-arab-worlds-oil-age-is-nigh>)。

稳定性。

因此，由于化石能源的价格低迷，以及随后所有发达国家都开始撤出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或者降低其在世界能源平衡中的比例，未来等待俄罗斯的只会是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其地缘政治影响力也会遭到严重削弱。如果说，几个月前这些论断还都只是抽象和遥远的推测，那么当前这似乎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现实。

（二）化石能源的未来

让我们来尝试弄明白，上述这些因素会导致什么结果。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由于高热值、运输便捷、广泛分布等独有的特征，石油成为20世纪下半叶的重要燃料。也正因此，人类很早就对其进行过集中地分析和预测。特别是在70年代石油危机以后。当时，阿拉伯国家出于政治原因限制了向西方国家的石油出口，由此导致油价飙升。

在不同的时期，实际上形成了预测世界原油市场发生戏剧性变化的不同理论。

“石油峰值”（Peak Oil）论认为，随着世界石油储量的不断消耗，原油开采和供应都会在某一时刻开始减少，这也会导致不可避免地导致短缺与涨价。

“石油需求峰值”（Peak Oil Demand）论认为，恰恰相反，由于其他能源，特别是清洁能源、绿色能源消费的增长，对石油的需求将会达到峰值，因此将会出现价格的下跌。

上述理论都没有得到证实。但与此同时，世界却正在见证油价的戏剧性暴跌，以致世界各国都必须努力对其进行调控。对于俄罗斯而言，结果则不仅表现在价格上，由于自愿减产，俄罗斯在石油的供应上也遭受了损失。这在短期内毫无疑问是对俄罗斯经济的打击。当然，俄罗斯财政部也已经证实，实际上可以通过加大石油储备的方式来渡过危机。而从长期来看，局势却仍不明朗：如果世界经济陷入衰退，那么石油价格就会缺乏上涨的动力。但是，如果危机之后出现爆炸性增长，那么情况就可能出现改变。尽管石油作为有害气体排放的来源，仍会受到引发气候变化的责难。

与石油不同，天然气不会给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压力。考虑到生态环境和

保持可再生能源平衡的巨大需求，以及天然气本身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较小，很多预测甚至认为在发展绿色能源的趋势中天然气所占份额会有所增加。而由于俄罗斯天然气在欧洲市场上具有很强的价格竞争力，因此，这对俄罗斯而言威胁不大。

煤炭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大。几乎所有的预测方案都在呼吁减少煤炭的消费。有些政府甚至都在酝酿削减煤炭消费的政策。但是，即使世界市场上的煤炭贸易得到削减，对于许多亚洲国家（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的能源安全来说，煤炭依然是一项重要的资源。俄罗斯作为一个巨大的能源出口国，应该对此引起重视。

（三）绿色经济中的俄罗斯

绿色经济的一个关键要素是使利用和污染环境的成本内在化，即令这些成本包含在效益之中，而非排除在效益之外。从前，企业在计算利润时并没有把这部分成本包含在内，将这些“包袱”都扔给社会处理。而现在，这一情况则正在得到改变。例如“碳定价”（Carbon Pricing）^①和“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②概念的应用。由于这些理念需要评估生产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因此它们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许多商品的价格，甚至包括能源产品本身。在俄罗斯的情况中，这可能导致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提高。在某些情况下，会是实质性，而不是短期的涨价。这些理念同样可能对其他俄罗斯出口产品也产生负面影响，例如，这种影响很可能以欧盟国家关税壁垒的形式出现。

那么，难道在世界经济向绿色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等待俄罗斯的就是必然的衰落吗？

前几年的经验，无论是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还是2014—2015年因西方制裁和石油价格下跌引发的经济衰退，都给俄罗斯当局好好地上了一课。它们教会了俄罗斯人通过灵活的税收、预算和货币工具应对短期危机。近年来，俄罗斯建立了一套高效的税收系统，因此预算收入即使在经济比较萧条

① 为碳排放规定额度，这一额度可以交易。也可以为不同的额度征收不同的税率。

② 追溯特定个人、集体或机构的碳排放集合。碳足迹越大，温室气体排放越多，反之亦然。

的情况下也不会减少。国家福利基金^①会动用财政储蓄来稳定金融系统、刺激经济增长。可以说,以相对较低的经济下滑程度为标志,短期内俄罗斯已经基本处置了当前的危机。但是,俄罗斯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并没有改变经济结构,因此也不会产生什么长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结构未能改变一方面是由于出现了车向前开、轮往后转,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车轮效应”(Эффект Коле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局担忧出现过于剧烈的变化。这其中各个领域的游说集团都施予了相当的压力。例如与德国相比。德国摆脱危机的主要策略是依靠延续其“能源转型过渡”(Energiewende)政策。但在俄罗斯,危机反而可能使得现有发展模式日趋保守。这首先就是由于主要政治和经济行动者都不愿进行重大改革。然而,这种情况是可以改变的。

实际上,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那么俄罗斯实际上在绿色经济中拥有很大的潜力。环境成本内化的理念实际上使得俄罗斯最主要的自然财富都能被引入经济循环当中。这些财富包括能吸收二氧化碳的森林以及作为可再生能源的淡水。如果采用“碳足迹”的评估方式,那么一些俄罗斯出口商品就能显著提高自己的竞争性优势。因为这些商品的生产过程主要采用的是清洁能源(水力发电)。这样的例子可以很多,学术界正在思考与研究这些问题。问题在于,它们暂时还没有在决策圈达成共识,因此就很难转化为政策。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需要确保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毕竟在向新能源过渡且放弃旧能源使用时,会造成一些问题。因为要对经济结构进行大规模调整,从业者的收入会遭受损失,就业机会也会相应减少。因此需要对这些人群进行补偿。如何在不造成社会经济重大动荡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目前的危机中做到这一点?这也正是公共管理领域专家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吸引和激励关键行动者,如何确保利益平衡,如何保证政策的系统性和长期性,以及如何保证政策的最终成功。如果能成功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俄罗斯经济就能摆脱危机,甚至从中受益。

① 俄罗斯国家福利基金(Фонд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благосостояния)是俄罗斯国家储备基金,是俄罗斯联邦为其公民提供退休保障的长效机制之一,主要来源于石油天然气企业的计划外收入。危机情况下也能对财政短缺进行补充。

七、结论

不难发现，虽然在许多观点上存在分歧和争论，但六位学者的评论还是显示出了对某些问题的集中关注和基本共识。

首先，从疫情与政治的角度，六位学者的评论都再次验证了亨廷顿的一个论断：复杂社会里的政治共同体依赖于该社会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强弱则又取决于这些组织和程序获得支持的广度及其制度化的程度。^①不同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但在面对疫情这种重大挑战时，一个制度化程度高的组织在度过初期的打击之后，都能协调和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处置并适应危机。任何一个比较复杂、相对自主，且具有一定内聚力组织都对社会危机具有一定的适应性。不同的国家虽然应对疫情的理念和措施有所区别，但基本都会找到一套为本国民众所接受的处置方法。从六位学者的评论中也可以发现，此类重大社会危机对政治共同体的考验并不仅仅在于短时应对，真正的考验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政治共同体是否能够对社会危机暴露出来的结构性问题予以改革。其二，政治共同体能否从社会危机中寻找到的潜在的优势，重新定位自身的发展方向。无论是深入改革的决心，应对压力集团影响的能力还是对社会变革速度、广度与深度的控制，都考验着政治共同体，特别是执政者的勇气与智慧。

其次，从疫情与政治学的角度，六位学者的评论显示，新冠肺炎疫情这类重大社会危机，除开疾病本身之外，对人类社会冲击最大的部分还是由于其牵动起的各种政治学问题。这其中，既有一系列悬而未决、争论不休的问题被重新提起，也有许多全新的、尚未获得足够思考与讨论的问题开始显露。在“老问题”中，全球化与民族国家问题、“世界政府”与“区域合作”问题、主权与人权问题、国家与社会问题、社会利益与个人权利问题都已经历了长久的讨论。各个国家、地区和政治共同体都基本找到并实践着一套适合自己的模式。政治体制的长短与优劣之争从前更多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在“新问题”中，一些争论也尤为引人注目。其一，政治与科技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今天的科技，已经不能被视作单纯的工具。它既是由高度组织化的机构

^① 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2页。

所生产，同时又深刻地嵌入并改造着人类的活动与交往。其二，政治应该如何对待人的生命？当代世界，人的生命需求早已不仅限于生存，还需追求健康与尊严。政治共同体对其成员的责任也就相应地突破了单纯调解人与人之间冲突以及对自然灾害的防治。其三，政治应该如何平衡社会的各种需求？社会的需求是多元而复杂的，且不同的需求之间还会形成叠加与联动。单纯满足一种需求，很可能导致政治重心的失衡，从而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因此，疫情这一重大的社会危机，实际上提示着人类社会必须迅速提高对政治思想的重视，加深对政治哲学的认识。人类社会需要深刻反思与另外两个世界的关系。其一，与非人类造物的世界，即自然的关系。其二，与人类造物的世界，即技术的关系。

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关键在于如何避免人向自然的复归。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命题即是人类的权利。“权”赋予了人类选择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却也使人摆脱了“律”的约束。早在16—17世纪，启蒙思想家就已预见到权利膨胀背后潜藏的威胁，因此特意强调权利根本上来自并受制于自然法。^①人对自然的权利不能脱离“人”的范畴。人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不是自然状态下的无限掠夺，也不是如野兽一样的自取所需，而是在人类社会约束之下的对全人类整体与每一个个体福祉的增进。对财富的过度强调、对权利的极端理解，可能使人的行动不仅越过成文法的范畴，甚至摆脱自然法的约束，复归于遵循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此时的权利，不仅不再是人类社会所掌控用以增进福祉的工具，反而会成为祸患的根源。正如19世纪革命思想家所指出的，这种不平等的、狭隘的“权利”会造成社会的衰颓和灭亡，因为从社会性、正义演变而来的公道，正是人类建立社会的根本动因，也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最大特征。^②社会促成权利的形成，也确保权利的实现。当社会撕裂成不同的阶级与群体时，完整、统一、平等的权利本身自然也就不复存在。因此，权利的正当性需要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之上方可证成，而绝不能以个人、小团体的私欲或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根基。

处理人与技术的关系，关键在于如何避免人为技术所异化。现代政治的

① 詹姆斯·塔利：《论财产权：约翰洛克和他的对手》，王涛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5页。

② 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孙晷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6页。

另一个重要命题即是人类的本质。工业革命带给人类对自然前所未有的改造能力，但同时也在冲击着人类对自然与自身的理解。早在19世纪初，思想家们就曾警示过，机器的到来会让人也变成机器。而在现代，这一论断则可以替换为，数据的到来可能使人变成数据。与人类社会向自然复归同样可怕的是人向抽象概念的递变。当人类的生命只被视作一个数字，生命的活动和痕迹仅仅被视为数据的集合，那么这毫无疑问就会造成人与人类社会的异化。人类社会通过符号来理解世界、记忆世界。但符号系统的背后必须有意义系统和价值系统的存在。工具本身是中性的，在使用者手中会成为工具，在好斗者手中则会成为武器。当人类本身完全被看作技术的目标，被解构为数据和符号时，那么符号背后的意义系统与价值系统也就不复存在。意义与价值泯灭的背后，潜藏着工具被用于满足私欲的威胁。奴役人，将人变成机器的，不是机器本身，而是另一批人。因此，技术的正当性也需要立足于社会正义的基础之上，也需要为人类社会所掌控，而绝不能成为一部分人所垄断的专利。

不可忘记，政治的意义在于人的本身。正是人的生命与福祉赋予了所有政治概念以内涵。无论是使人变成野兽，还是变成数据，都将是对政治学初衷的最大背离。